

回憶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學

朱光潛

．．．第一次歐戰剛剛完結，教育部在幾個高等師範學校裏選送了二十名學生去香港大學學教育，我是其中一個當時政府在北京。我們二十人雖然有許多不同的省籍，在學校裏卻被稱為“北京學生”。“北京學生”在學校裏要算一景。在洋氣十足的環境中，我們帶來了十足的師範生的寒酸氣。人們看我們有些異樣，我們看人們也有些異樣。但是大的摩擦卻沒有。學會容忍，“異樣”的人受了一種教育，不能容忍“異樣”的人見了“異樣”增加了自尊感，不能接受“異樣”同化的人見“異樣”，也增加了對於人世的新奇感。所以同學雖只有四百餘人，因為各種人都有，色調很不單純，生活相當有趣。

我很懊悔，這有趣的生活我當時沒有儘量享受。“北京同學”大抵是化外之民，而我尤其是在鼓裏過日子。一般同學的多方面的活動我有時連做壁上觀的興致都沒有。當時香港的足球網球都很負盛名，這生來與我無關。近海便於海浴，我去試過兩三次，喝了幾口咸水，被水母咬痛了幾回，以後就不敢再去問津了。學校裏演說辯論會很多，我不會說話，只坐在旁邊望人開口。當時學校裏初收容女生，全校只有歐文小姐和何東小姐兩人，都和我同班。我是若無其事，至少我不會把她們當女子看待。廣東話我不會說廣東戲我不會聽，廣東菜我沒有錢去吃，外國棋我不會下，連檯球我也不會打。同學們試想一下，有了這段自供，我的香港大學資格不就很有問題了麼？

讀書我也不行。從高等師範國文系來的英文自然比不上生來就說英文的同學。記得有一次作文，裏面說到坐人力車和騎馬不是很公平的事，被一位軍官兼講師的先生痛罵了一場。有一夜生病了第二天早晨浮斯特教授用當時很稱新奇的方法測試智力，結果我是全班倒數第一，其低能可想而知。但是我在學校裏和朱鐵蒼和高覺敖有 **Three Wise Men** 的混號。**Wise Men** 當然是 **Queen fish** 的教好聽的代名詞。當時的同學大約還記得香港植物園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無論在哪一個季節，都可以在水池後面的人行道上看見三位老者，坐在一條凳上曬太陽。度他們悠閒的歲月。朱高兩人和我形影相伴，容易使同學們聯想到那三位老者，於是只有那三位老者可以當的尊號就落到我們頭上了。

我們三人高矮差不多，寒酸差不多，性情興趣卻並不相同，往來特別密切的緣故是同是“北京同學”，同住梅舍，而又同有午後散步的習慣。午後想來少課，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爬到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於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霎時間把腦海裏一些重載卸下，做一個“空空如也”的原始人，然後再循一條小徑下山，略有倦意，坐下來吃一頓相當分豐盛的晚餐。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寫到這裏，我鼻孔還嗅得著太平山頂晴空中海風送來的那一股清氣。

我瞑目一想，許多舊面目都湧現面前。終年坐在房裏用功、虔誠的天主教徒郭開文，終年只在休息室裏打檯球下棋、我忘了姓名只記得渾號的“棋博士”，最大的野心在娶一個有錢的寡婦的姚醫生，足球領隊的黃天錫，辯論會裏聲音嚷得最高的非洲人，眯眼的日本人，我們送你一大堆綽號的“**Mr. Colli**”，一天喝四壺開水的“常識博士”，我們“北京學

生”讓你領頭，跟你像一群小雞跟母雞去和舍監打交涉的 Tse Foo（朱複），梅舍的露著金牙齒微笑的 No One-----朋友們，我還記得你們，你們每個人都曾經做過我閒時玩味的資料，於今讓我和你們每個人隔著虛空握一握手！

老師們，你們的印象更清晰。在教室裏不丟雪茄的愛理阿特爵士，我等待了四年聽你在課程指導書裏宣佈要講的中國倫理哲學，你至今還沒有講。天氣好你就來，天氣壞你就回英國，像候鳥似的龐孫倍芬先生，你教我們默寫和作文，每個錯字都寫在黑板上來講一遍，我至今還記得你的仁慈和忍耐。工科教授勃郎先生，你不教我的課，也待我好，我記得你有規律的生活，我到蘇格蘭，你還差過你的朋友一位比利時小姐來看我，你那封長信我至今還沒有回。提起信，我這不成器老欠信債的學生，你，辛博森教授，更有理由責備我。但是我的心坎裏還深深映著你的影子。你是梅舍的舍監，英國文學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我跟你學英文詩，第一次讀的是“古舟之詠”，我自己看第一遍時，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鳥的故事是多麼乾燥無味而且離奇可笑，可是經過你指點以後，它的音節和意象是多麼美妙，前後穿插安排是多麼妥帖！一個藝術家才能把一個平凡的世界點染成一個美妙的世界，一個有教書藝術的教授才能揭開表面平凡的世界，讓蘊藏的美妙世界呈現出來。你對我曾造成這麼一種奇跡。我後來進了你進過的學校——愛丁堡大學——就是因為我佩服你。可是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訴你，你介紹我去見你太太的哥哥，那位蔚頓大律師，承他很客氣，在三叮囑我說：“你如果在法律上碰著麻煩，請到我這裏來，我一定幫助你。”我以後並沒有再去麻煩他。

最後我應該特別提起你，奧穆先生，你種下了我愛好哲學的種子。你至今對於我還是個疑謎。牛津大學古典科的畢業生，香港法院的審判長，後來你回了英國，據郭洽周先生告訴我，放下了獨身的誓，結了婚，當了牧師。你的職業對於你是不倫不類。你是雅典時代的一個自由思想者，落在商業化的大英帝國，還緬想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在學院裏從容講學的論道的那種生活。我相信你有一種無人可告於的寂寞。你在學校裏將可不領薪水，因為教書拿錢是蘇格拉底所鄙棄的。你教的是倫理學，你堅持要我們讀亞里斯多德，我們瞧不起那些古董，要求一種簡賅明瞭的美國式教科書。你下課時我們跟在你後面罵你，雖是隔一些路，卻有意“使之聞之”，你擺著跛腿，偏著頭，若無其事地帶著微笑向前走。校裏沒有希臘文的課程，你苦勸我到你家裏跟你學，用汽車帶我去，我學了幾回終於不告而退。這兩件事我於今想起面孔還要發燒。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由於你的啓發，這二十多年來，我時常在希臘文藝與哲學中吸取新鮮的源泉支持生命。我也曾學你，想竭我一點微薄的力量，設法使我的學生們珍視精神的價值。可是我教了十年的詩，還沒有碰見一個人真正在詩裏找到一個安頓身心的世界，最難除的是裴利斯丁（庸俗市民）的根性。我慚愧我的無能，我也開始瞭解你當時的寂寞。

寫到這裏，不覺有些感傷不想再寫下去。許多師友的面孔讓我留在腦裏，慢慢玩味吧！香港大學，我的慈母，你呢？於今你所哺育的子女都星散了，你在那山峰的半腰，像一個沒有鳥兒的空巢（當時香港被日本人佔領了——編者），你憑視海水聞到腥臭，你也一定有難言的寂寞！什麼時候我們這群兒女可以回巢，來一次大團聚呢？讓我們每一個人遙祝你早日恢復健康與自由。

寫於三十三年（1944年）春嘉定武漢大學